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esearch

2012年 第7期

总刊第25期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编

要 目

- CCG 活动** 纪念 77、78 级毕业 30 周年——“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成功举办
CCG《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正式发布
- 建言献策** 饶毅：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海归
汤敏：中国如何才能不被甩出第三次工业革命？
张维迎：理念改变未来
- 人才培养** 王辉耀：少年强则中国强，中国需要更多青年成才
- CCG 简讯** CCG 主任出席慧眼中国环球论坛
CCG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中期研讨会
CCG 应邀出席“2012 年全国人事人才科研年会”
CCG 应邀在广东东莞“松湖大讲堂”讲课
CCG 参加人社部留学回国工作课题研讨会
CCG 主任参加上海国际英才创新创业活动周
CCG 受邀出席杭州“2012 侨界海外精英创业创新峰会”
CCG 参加《宏观人才学》书稿第二次会稿研讨会
-

www.ccg.org.cn

电话：010 - 65611038, 65611039, 65611041 传真：010 - 65611040

邮箱：bianjibu@ccg.org.cn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主办单位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合作单位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

总编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崔大伟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段培君 中共中央党校战略学研究室主任

黄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

李连仲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林晓华 加拿大Ryerson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

刘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裴敏欣 美国克莱蒙大学政治学教授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汤敏 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张旭东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特邀专家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鲍曙明 密西根大学中国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丁学良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范文仲 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

傅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郭生祥 澳大利亚澳华金融专家协会理事长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靳志伟 欧美同学会秘书长

胡元豹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兼执行长

胡兆庆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

李百炼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副校长

李稻葵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磊 日本法政大学工学研究生院院长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梁能 中欧商学院管理学教授，EMBA主任

罗亚东 美国迈阿密大学战略与国际商务讲座教授

梅平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

彭维刚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管理学院讲座教授

丘成桐 美国哈佛大学数学教授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经济学院教授

隋殿志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助理校长

孙选中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唐永春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中心主任

王坚 美国南加州大学安传播学院教授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终身教授

王晓东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王晓萍 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司司长

吴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

项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谢国忠 玫瑰石顾问公司独立经济学家

谢宇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徐小平 真格基金会创始人

许睢宁 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

颜海平 康奈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

杨锐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

杨壮 北京大学国际MBA国际院长

张忠 美国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

张健青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副司长

张力奋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

张信刚 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美国百人会会员

赵红心 美国圣路易大学财经教授

赵德生 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执行主编：苗绿

责任编辑：邓莹

编 务：赵映曦 吴雪宝

CCG 活动

纪念 77、78 级毕业 30 周年

“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成功举办

2012 年 6 月 30 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媒体文化和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梦’回顾与展望——纪念 77、78 级毕业三十周年”论坛隆重举行，77、78 级同年学人精英和百余人集聚一堂回顾往昔岁月，畅谈“中国梦”，展望未来发展，并就“新时期的转型升级与中国教育发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大国崛起”、“中国走向世界和国际认同”、“人才强国和中国梦”等专题分论坛展开讨论，最后以“未来 30 年”的圆桌论坛形式作总结。

会议 77、78 级优秀代表以及其他各界精英人士和媒体代表 100 余人。会议包括开幕式和五个分论坛：“新时期的转型升级与中国教育发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大国崛起”、“中国走向世界和国际认同”、“人才强国和中国梦”和“未来 30 年”的圆桌论坛。

欧美同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央候补委员张杰，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上海交通大学媒体文化和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颜海平，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蒋述卓，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清华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作家刘震云，中央党校战略学研究室主任段培君，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圣来，新东方学校创始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麦可思公司创始人、首席专家王伯庆，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拓展执行合伙人陶景洲，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所长葛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周斌，中山大学数计学院“千人计划”教授许跃生，国家现代服务业重大专项规划协同作业总体组组长汪晓来，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执行会长韩清源等 77、78 级嘉宾也出席了论坛并发言。

“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开幕式：77、78 级是具有时代使命感的特殊群体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论坛主席王辉耀主持论坛开幕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韩启德、教育部副部长的郝平、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为论坛致辞。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韩启德在发言中说：“为什么 77、78 级出那么多人人才？无非就这么几个原因：第一，77、78 级在文革 12 年以后招一届大学生，那么多人挑选一届两届，那最好的人肯定都凭功夫考进来的，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那。第二，激情燃烧的那个时代给大家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我想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那个时候，大家在那样的时代都是有梦的，尽管是朦胧的，而且这样的梦大体从总的背景是相当一致的。梦永远是朦胧的，否则不称之为梦。但梦表示一种希望，大家都有类似的梦，那就是一种凝聚。”韩会长认为：“再过 50 年，再过 100 年，我们的后人看我们的今天，回忆 100 年前他们的先辈在这里学什么、想什么、做什么，那时再想今天‘中国梦’这个话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同是 78 级毕业生的教育部郝平副部长在致辞中讲道，77、78 级首届大学毕业生能够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应该说是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这个辉煌的年代，得益于逐步恢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得益于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的推进与实施。

本次论坛主席 77 级的王辉耀先生提出，77、78 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他们既是思考和探索的一代，也是改革和开放的一代，更是善于反思自身和不断开拓的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需要进行全面的反思，究竟未来道路如何走？这种纪念和反思也是我们发起论坛的重要原因。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回顾了渴求知识和科学的校园时代：“当年大学里的我们年龄相差悬殊，兄弟同班、父子同校屡见不鲜。当时的我们可谓是真正的五湖四海。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熄灯后的宿舍总是灯光点点，大家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求在被整整蛰伏 10 年后被激活迸发。”

与会的 77、78 级嘉宾共同回顾了伴随他们成长发展的中国改革变迁的 30 年，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感悟，重新审视当前社会的发展，反思自我、重话梦想，现场讨论和互动气氛十分热烈。

分论坛一：新时期的转型升级与教育发展

77、78级从考上大学和走出校门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突破和重要现象，至此，高等教育也产生了深层改革，高校该如何发展？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何缺陷？与会各大高校的校长均出身于77、78级毕业生，他们纷纷谈了自己的看法：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认为当今中国大学要培养的学生，能够适应“向来就存在于中华民族中的理性品质”。这种理性品质，不仅在科学技术上实现高层面国际化，而且要达到在和他人、同事打交道时讲究理性。

在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看来，77、78级学生的优势就在于阅历。经历复杂，社会摸爬滚打，使其意志力极强。“现在的学生为什么看问题不深不厚？我认为，就是阅历不足”，他指出，尤其目前文科学生，更是阅历不足。目前，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重要一面就是能力培养。能力不足是目前大学生更为缺乏之处，从这一角度，在教学方法上，也要加以改革。

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认为，目前高等教育缺乏严格学术训练，需转变教育培养方式。硕士生导师、博导所带的学生太多，很多理工科教师将研究生当成廉价劳动力，超过一半的论文为学生所写。陈春声建议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而非“老板”关系。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提出，教育公平是目前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中小学教育资源存在不平衡，高校也如此。目前全国仍有13个省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未得到中央财政支持。十二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应该成为基本发展思路，教育的不公平和不平衡应该转变。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文化和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颜海平主持了该分论坛。

分论坛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大国崛起

在分论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大国崛起”中，文学艺术领域的嘉宾悉数发表了自己的感想。论坛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主持。

北大中文系78级同学、著名作家刘震云首先谈到，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方面，我们不必过于焦虑和急切，不能忽视了中国语言和文化本身的独特之处。而中国的教育存在很大的问题，中国大学入学考试考得是脑子，是记忆，因此，中国的学生不会“闻一知十”。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在教育的改革中担当重任。

英国剑桥语言文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曹莉从文化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角度谈了文化

强国的意义。大学有文化遗产的功能，这个功能应该是大学的本质功能。也就是说大学除了各个院系或者学科的组合之外，应该是人类思想和意识的中心，而不仅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中国的大学还要提出关于社会和人类根本性的问题，向全世界交流或者是传播促进世界发展、推进人类文明的思想学说。目前国内大学通过通识教育来改革，但存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的问题。这点上，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方法和理念。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周斌认为，虽然中国的科技发展十分迅速，但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特别是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他援引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话“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西方国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但轻视中国当代文化，原因是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没有“文化自觉”。我们应该尊重和学习他人的文化，同时了解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

分论坛三：中国走向世界和国际认同

走向世界并得到国际的认同，不仅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在国际认同方面，美国的力量是分散的，所以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面临的情况是什么？中国和美国面临的认同有相似之处，也因为发展阶段不一样而有所不同。所以，中国该怎样走向世界并得到国际认同呢？77、78级同年们就此进行了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谈中国的国际认同时，谈到了自己工作时的体会：中国的工作人员在向外国介绍我国状况时爱讲官话，让外国官员听不懂，造成外国人对我们的不理解。再者，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没有转型，学者们和行政者都存在不尊重大众一般性需求的现象。中国需要开通知识与社会沟通的环节，建立一个知识互动的平台。

国务院中国现代服务业重大专项规划协同作业总体组组长汪晓来从中国的各类规划方面谈了对中国国际化的体会。他认为，中国的各类规划，包括城市规划和社会规划，与国外存在很大差别。比如，中国的社会各类规划应该先确定不做什么，而不是什么都做，也不是按照领导的意志去做。我们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也不能单纯为了全球化而规划，而是要像国外城市一样，找到我们服务的对象和理由，了解自己城市的特性。中国要取得国际认同，就要走国际的道路，按照国际的规则行事，这样才能被世界所认同。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朱苏力认为，中国的学者应该保持努力学习的状态，中国也是一样，

像三十年前说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样才能走向世界。但是，他认为中国不应该过分在乎世界认同，应该树立起足够的民族自信。

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谢思敏谈了他对国际化的看法。他认为，77、78级学生毕业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大量派遣留学生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回国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国际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现在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独立的思想、思潮，缺乏创造思想、创造新思想的自由。我们要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会，放松政府管制，建立能够自主、自制、自律的非政府组织。

分论坛四：人才强国和中国梦

这是一个人才大量流动、大量外出的时代，海外回来的留学生只占留学生总人数的30%左右，所以，我国面临严峻的人才流失的局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也在打造一个“中国梦”，实际上这个“中国梦”也是人才强国之梦。如果不跟人才结合起来，“中国梦”就无从谈起。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谈到，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人才问题。我国出现723高铁重大事故，一方面是我们的高铁技术确实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就是缺少懂高铁技术的人才。我国下一步要培养各种人才——创新人才、领军人才，这对于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十分关键。作为77、78级的大学生，作为高等学校的管理者，有为国家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领军人才的责任。

新东方、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认为，在以前，中国缺少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这类人才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不能长期适应国际化的岗位。现在，虽然多数海归都拥有了国际化视野，而他们依然没有成为合格的国际化人才，由海归变成了海待。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海归在留学期间没有对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深入把握。在未来的三十年，中国人需要开放胸怀，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学习国外的东西，更好的把握这些东西。

麦可思创始人、首席专家王伯庆谈了自己对高等教育的看法。他认为，由于中国的新生儿数量不断减少，导致人才数量上的下降，而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提高了人口整体素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才数量上的下降，支撑了中国人才的长期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只重量不重质的现象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需要人们理解和接纳，并持续向质量提高的方向去努力。

中山大学数计学院千人计划专家许跃生认为，首先，与美国相比，中国缺乏对人才的基本尊重。比如说，在中国，只有加上“长”或者“特殊教授”等头衔后，人才才受到尊重。其次，中国高校中，科教人员的工资水平过低，发放的奖金大多是通过各种申报项目和头衔的申请加上去的，这样会产生很多行政成本。第三，制约中国科研发展的不是经费，是文化和体制问题。我国的官本位文化过于严重，科研体制严重制约科研发展。因此，我国在科研体制和理念上都要有突破，才能实现国内教育和中华民族的崛起。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拓展执行合伙人陶景洲认为，中国要建成一个人才的强国，就要建立一个宽容的环境。除了专业的知识、宽阔的胸怀和世界的眼光，还要诚实做人。中国是一个仿制型的社会而不是创新的社会，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知识的保护不够。因此，要给人才一个认真做事的环境，让他们踏实做事，而不是追求浮躁的、虚假的东西。

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的执行会长韩清源认为，关于人才的问题，一个是要教育培养人才，一个是要吸收人才回来。现在我们国家发展非常飞速，但是国内的道德水平好像没有了底线。教育人才方面，不管是在大学还是中学的教育里面，要随时随地潜移默化教给孩子做人的道理，让道德教育生活化。吸引人才方面，我国有千人计划、百人计划，让人感觉到了宽松、自由的政策环境。99%的在海外的华人心里都有一个中国梦，因此要吸引海外华人回来。

分论坛主持人王辉耀提出，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中国梦”，实际上这个“中国梦”也是个人才强国梦，如果“中国梦”不与重视人才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中国梦”便无从谈起。

圆桌论坛：未来三十年，“中国梦”如何实现？

对于下一个30年如何走下去，嘉宾们大胆畅想，建言献策，他们的心中都有着对“中国梦”的憧憬。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希望大家把77、78级作为一个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的课题来研究，把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经历作为一个学术史或者思想史的命题来讨论、敲打和批判。这既是对77、78级学生的一种促进，也是对后来者负责任。

中央党校战略学科带头人段培君从战略角度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二战以后，由于战略文明形态的转变，全球发达国家生产力大概提高了100倍，可见战略文明转型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因此，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应该从战略角度去总结经验，未来的三十年，应该持续这种战略形态的文明转型。

本次论坛主席、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结合自身的经历谈了 77、78 级同学的未来使命。他说，77、78 级大学生是历经磨难曲折的走过来的，现在很多人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现在，中国处在转型的历史关口，77、78 级同学更应该反省自身的不足，思考在自己的位置上能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做些什么。77、78 级同学应该树立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搞清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 77、78 级同学这个群体中形成共鸣。这也是本次论坛活动的意义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伴随着人均 GDP 的升高，中国未来面临着一系列的养老等社会问题，未来的规划如何，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需要改变内部结构性的体制，让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人也应该多反思自己身上的缺点，少说空话。

圆桌论坛最后，77 级中文系出身的上海交通大学媒体文化和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颜海平教授用文学的方式，将“底层中坚、承上启下、反省担当、中外汇合、扬帆远航；旧邦新命、路途正远、共图前景、共同担当、再创辉煌”赠送并勉励她的同年。

此外，论坛还将就 77、78 级嘉宾的发言集结出书，并邀请发言代表撰写个人毕业 30 年的“中国梦—回顾与展望”征文，由相关出版社出版。

CCG《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正式发布

2012年7月23日，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欧美同学会联合发布“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2012）No.1》，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本重点研究海归群体回国创业及在相关领域发展的蓝皮书。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携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2012）No.1》一书亮相。

《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2012）No.1》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中心共同编写，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旨在全面反映中国海归创业发展的最新情况，梳理国家鼓励海归发展的最新政策。本书在大量实地访谈、问卷调查和政策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海归创业的特点，分析了中国海归创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重点分析了海归回国的原因和所面临的障碍、海归回国发展的优劣势、海归就业和创业的现状，比较了海归创业和本土创业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专题研究了海归如何与民营企业结合等。此外，蓝皮书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海归回国发展及回国创业的政策建议，系统归纳了国家层面及地方层面鼓励海归回国创业的政策，并分析了相关政策创新对中国海归回国创业的推动作用。

在发布会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杨群首先介绍了《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2012）No.1》的编辑出版情况；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作了题为“转型时期：中国机会与海归创业”的汇报，重点介绍蓝皮书的核心内容；诺华中国区总裁易珉、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葛明、中国价值网 CEO 林永青、麦可思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娇、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许睢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学术传播中心主任刘德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郭峰等嘉宾对海归创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参会嘉宾一致认为本书综合权威专家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为海归发展描述整体情况、梳理政策脉络、提出多角度和操作性建议及理论指导，为我国海归创业者、海归研究者和政策决策者提供实践指导、学术资料和决策参考，在促进对海归创业健康稳步的发展，促进海归创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深入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将对我国海归创业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高科技、新经济以及知识服务产业领域，是海归成功创业的主要阵地

目前，鼓励海归回国创业的政策很多，究竟海归在哪些领域创业更容易获得比较优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根据样本研究，互联网、IT 和通信等高新产业领域创业成功的海归占到了 70% 以上，还有 20% 的海归集中在咨询、法律服务和教育等知识服务经济领域，只有 5% 左右是在制造领域。调查说明海归在自身擅长、有专业技术优势、国内外差距较大的高新技术领域里创业，独具优势。海归们踊跃回国创业的贡献，也突出体现在推动国内在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IT、通信、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他们创办和管理的百度、亚信、UT 斯达康、搜狐、新浪、中星微电子、当当、携程、E 龙、空中网、尚德集团、展讯、启明星辰等企业，成为中国新经济和高科技的主流。例如，在美国以高科技板块著称的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中，大部分的中国企业是由海归创办和管理的。高科技产业、新经济领域、知识服务产业，成为海归创业的主要阵地，也是最能发挥海归创业优势的领域。

社会文化类障碍是海归人才回国的最重要的障碍

海归人才回国障碍是国内用人单位和相关部门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对海归人才的四大类、十余种可能的回国障碍进行调查，并让参与调查的海归人才对回国的障碍因素进行打分。结果表明：社会文化类障碍是海归人才回国的最重要的障碍（79.6% 的海归认为社会文化是他们回国的重要障碍），其次是政策制度方面的障碍（69.6% 的海归认为政策制度方面的因素是他们回国的重要障碍），再次是家庭生活方面的障碍（67.2% 的海归认为家庭生活方面的因素是他们回国的重要障碍），最后是职业发展方面的障碍（67.2% 的海归认为职业发展方面的因素是他们回国的重要障碍）。

这与海归人才回国的原因是相对应的。在对海归回国原因的分析中，海归回国的主要原因依次是职业发展原因、家庭生活原因和社会文化原因，因此海归回国主要是受到国内发展机会和家庭团聚的吸引，但因为认同国内文化或无法融入海外文化而回国的较少。相应的，在海归回国障碍的分析中，海归顾虑最多的是社会文化障碍，政策制度和家庭生活障碍居中，而顾虑最少的是职业发展障碍。因此，综合而言，国内的职业发展机会是吸引海归回国的主要因素，也是海归顾虑最少的方面；但社会文化障碍则是海归回国的最大顾虑。海归回国政策对海归有一定吸引力，但政策制度方面的障碍也是阻碍海归回国的重要因素；家庭生活方面的因素是海归回国的重要动因和重要障碍，其重要性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并不高。

海归创业与本土民营企业需要共同的合作基础

海归创业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发展，不是简单的“技术与资金”、“国际市场与本土市场”、“人才与资本”的优势互补就可以了，因为这只意味着双方具有合作空间。在创业海归与本土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难以谈成的例子中，最常见的互相抱怨就是：本土民营企业抱怨海归只想智力入股，创业失败时不担风险，且在股权上狮子大开口；海归则抱怨本土民营企业出资就想要控制权，实际上是自己当高级打工者而非合伙人看待。

海归创业与本土民营企业对接合作，双方应该存在合作的“共同基础”。这一共同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形成既共利共赢又一损皆损的共同利益基础，能共同承担风险、分享成果，形成合适的股权配置。另一方面，双方还需要在理念、价值观上达成一定程度的一致，并形成共同的长远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

海归和民企对接的重要接合点就在高新技术领域，但研发某个产品包括高技术产品有一定周期，市场化也有一个过程。有时候，即使创业海归自己出资，形成了共担风险的局面，双方也不容易形成信任感。许多时候政府出面扮演第三方黏合剂的角色会是个很好的选择，对于合适的高新企业，政府可以出资入股，形成股权三足鼎立、没有一方可以单独获得控制权的局面，这样也有利于保障海归与本土民营企业各自的长远利益。

创业海归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 女性海归创业者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但是在初期出国留学访问学者较多，年龄大的较多。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从攻读博士逐步发展到硕士，甚至是在海外读本科或中学，留学低龄化趋势更加明显。由于他们走出校门后大部分选择了回国就业、创业，因此海归就业、创业也开始呈现年轻化态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向苏联选派的 3 万余名留学生中，就有不少风华正茂的女留学生，她们归国后，在各条战线作出了卓越贡献。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留学大门重新敞开，留学潮风起云涌，在留学和归国大军中，仍有大批英姿飒爽的女留学生身影。从 19 世纪晚清中国第一代女海归，到 21 世纪中国的女海归，海归女性们从彼岸到故国，凭海临风，美丽绽放，独领风骚，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千人计划”评审专家组组长、原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在“庆祝中加建交 40 周年——海归·纽带论坛”上也表示：“女性海归带领团队创业的现象增多，而在此前创业者多为男性留学归国人员。”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社会角色也愈加重要。女性在创业过程中的优势也逐渐显现。国外的求学经历让女海归们拥有了更宽广的眼界，同时也给了她们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与技术促进高级顾问梁丹对于中国年青一代女性也充满信心：“这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中国女性有能力和智慧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女留学生非常出色，她们对美好的未来有强烈渴望，工作努力，善于沟通，比男性更有亲和力和包容性，而且能更快适应新环境。这样的素质在未来社会竞争中会更有优势！”

作为中国首部国际人才蓝皮书，本书的出版和发布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截至 2012 年 7 月 26 日，新书发布受到了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人民网等上百家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掀起了社会关注海归创新创业的新高潮。相关新闻报道如：

中国新闻网：《海归创业蓝皮书：中国经济发展机遇是海归回国主因》

凤凰网：《蓝皮书称中国海归回国择业首选事业单位》

法制晚报：《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国际人才蓝皮书指出——海归创业最怕“人情世故”》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鸥”人数激增 引才文理不均》

人民网：《海归创业蓝皮书称中国海归回国择业首选事业单位》

新华网：《中国海归创业成功企业集中于高新知识密集行业》

中国教育报：《中国首部国际人才蓝皮书发布 描述海归创业态势》

中国广播网：《中国海归创业成功企业集中于高新知识密集行业》

中国日报：《海归创业蓝皮书：中国经济发展机遇是海归回国主因》

中国网：《中国首部国际人才蓝皮书描述海归创业态势》

千人计划网：《中国首部国际人才蓝皮书描述海归创业态势》

光明网：《首部国际人才蓝皮书：社会文化类障碍是海归人才回国重要障碍》

环球网：《中国首部国际人才蓝皮书发布 描述海归创业态势》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蓝皮书：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 中国四成“海龟”是“海鸥”》

欧洲时报：反向文化冲击成海归回中国最大障碍

建言献策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海归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饶毅

我在美国工作 22 年后回国，除了已经强调的归属感外，也因为对中国的远景有信心。但对近期，我和很多人一样有诸多担忧。作为科学研究者，我担心中国科学的基础不够坚实。

1. 科学值得大家关心

1978 年初，我上大学前不久，以郭沫若名义撰写的《科学的春天》、徐迟采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先后发表，激励了一代中国人投身科学。30 年后，时过境迁，从海外回来感受到国家的巨大进步，也感到全社会对科学的态度有很大变化。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新华社发了消息，但社会上、即使在科研单位似乎也鲜有反响。

当前社会上有几种说法，比如，中国用不着做科学，抄别人专利也能发展；日本不发展科学，也成世界经济强国；或认为娱乐、服务和金融是中国强大的关键所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重申科学研究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从精神层面来说，科学研究是现代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和培养的创新精神是国家进步所必需；从应用而言，科学直接关系国家生存、经济发展、人民健康，所以科学与技术，不仅是科技人员的事业，基础研究，不仅是科学家的爱好，它们值得中国科学界之外的民众来关心，因为它从来就影响着国家兴亡、民族强盛。

1.1 美国科学家的比喻：面包与面包屑

1883 年，美国科学家罗兰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有几句话非常刺激。他说，“我时常被问及，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何者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如停止科学的进步，只留意其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应用，却从未追问过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正确探索其原理，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

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当其他国家在竞赛中领先时，我们国家（美国）能满足于袖手旁观吗？难道我们总是匍匐在尘土中去捡富人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并因为有更多的面包屑而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富裕吗？不要忘记，面包是所有面包屑的来源。”

1.2 科学硬实力是现代大国强盛的基础

从历史上来看，现代大国的强盛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以曾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例，人口 6 千万，面积 24 万平方公里，小于四川省面积，但曾占有全世界 1/4 的土地。原因之一，是此前几百年，就有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有剑桥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使得英国科学曾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再看现代新兴产业生物技术在美国如何诞生，这与我 1980 年代就读的旧金山加州大学有关。1973 年，旧金山加州大学从事基础研究的生物化学家 Herb Boyer，与斯坦福大学的微生物学家 Stanley Cohen 合作，发明了“重组 DNA”技术，不仅推动了生命科学的研究，也获得广泛应用。1980 年他们获专利，该专利成为世界上获利最多的生物医学专利。1976 年，40 岁的生物化学家 Boyer 与 29 岁的风险投资家 Swanson 商谈几小时后，决定在旧金山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基因技术公司。而后，以教授为首的公司纷纷在旧金山湾区以及波士顿地区建立，这些教授在产业、创新上领航发力，奠定了一个新的现代产业。

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影响了多个行业，如医疗诊断、农牧业，也改造了制药行业，20 个销售量最大的药物中，8 个是与生物技术相关的新药，而非传统药物。

所以，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导致技术创新、导致经济发展，导致国家强大，这是现代大国崛起的必然规律。

所谓日本科学不好而经济发展很好，这是误解。日本科学不如美国，但比中国好多了，日本 1949 年获得首个诺贝尔奖，迄今已获奖约 20 位，中国还是零；生物医药研究方面，我们不如日本 1980 年代的世界地位，那时日本已有几个诺贝尔奖级的工作；日本有年销售近 160 亿美元的武田公司，而中国全球大厂数量为零，这正是因为日本生物医学研究优于中国。与美国比起来，日本技术创新还不够多，有些领域还受制于美国，不能完全掌握产业的

发展，所以它也无法靠调节金融来影响世界。调节金融的基础是国家有硬实力，没有硬实力不能主导软实力。

1.3 健康、生存条件的改善离不开科研

我们固然要发展服务、金融、娱乐业，但是，老龄化带来的健康、医疗和生活质量问题，人口剧增带来的能源、资源问题，中国后 30 年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原创技术，没有科学研究做支撑，无法顺利解决。

迄今为止，我国绝大部分药是西方发明的。但是，像肝炎，西方发病率低，因此并非研发重点，而中国是肝炎高发地区，有近亿患者，但因为无法依赖进口，我们迄今仍缺乏有效的肝炎治疗药；国人主要食物之一大豆 80% 依赖进口，而美国农作物生产过剩，如果美国人为我们提供廉价水稻来垄断全球粮食，我们是否有对策？因此，能否保证中国食品安全，也必需依赖科学技术。

国家和人民对科学有需求，我们中国科学界能迎接这样的挑战吗？

2. 中国科学水平还有很大改善空间

我对中国科学远景很乐观，但对现状很担忧。一般来说，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已经脱贫。但不争的事实是——重大的科学工作少，原创性科学研究对产业和经济影响小。在科学基础薄弱时，中国的技术发展绝大部分依赖国外技术，中国科学界培养了一批人，其中部分参与产业，跟踪国外的科学技术发明，同时微调某些工艺作为创新。

所以，孙中山先生“同志仍需努力”对我们今天的科学界仍然合适。

中国科学研究水平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我们目前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也低于中国的历史记录，低于国家科研经费的增长，低于人民对科学的需求。

2.1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大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相对水平低于美国 1910 年水准。那年，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

人均 GDP 为世界第一的瑞士，国家很小，却重视科学，有 21 位自然科学的诺奖获得者。在生命科学领域，瑞士有较多企业入围世界医药前十强，大药厂 Novartis（诺华）年销售 500 亿美元，年利润 100 多亿美元，而年研发经费是 80 亿美元——这个数字可能超过全中国对生物医药研发和生命科学研究的资助。

最近媒体报道，说中国科学论文发表量是世界第二。英国《自然》杂志为了赚钱，近年出版《Nature Communication》，《细胞》出版社出版《Cell Reports》，前几年另一国外出版社出版了《Plos One》，这些以版面费牟利的杂志，大量收到中国的投稿，它们不代表中国科学的水平有所提高，仅是低水平论文数量增加而已。

2.2 以量取胜会沦为仅做“辅助工作”

当代中国科学研究与近代的辉煌期相比有距离。中国数学的高峰可能是西南联大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年代；应用方面的高峰，1960 年代有两弹一星，1970 年代，有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屠呦呦的青蒿素和张亭栋的砒霜治疗白血病，都优于现在。

与国家投入的经费增长相比，我们也有距离。过去几年，中国科研经费以每年 20% 的速度在增加，两倍于 GDP 增速。有部分实验室，不少硬件已经超过国外，有些单位竟然以买断国外某种仪器而成为国际突出。经费增加后，成果数量确实增加了，但质量的增加非常有限。在科学领域，数量是第一还是第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质量。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比差越大，问题就越大。数量提高以后质量提高，其间有个过渡，不是不可以，只是不能以数量为目标。科学和技术的本质中，质量和高度特别重要。从科学来讲，质量最好的人功劳最大，其他人只是辅助者；从应用专利而言，首先获得发明和专利的人最能赢利，其他人的改进和应用只是得小钱。所以在科学技术方面，数量常为质量“打工”。

中国今天科学研究的水平也低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在应用方面，我们希望科学研究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人类健康，并从目前大量的加工、拷贝、山寨、盗版的初级阶段，走向自主创新，从而对得起纳税人提出的合理要求。

所以从以上四方面看，中国科学、中国科学界整体仍面临挑战。

3. 中国现行科研体制可以改革

中国的科学研究要良性发展，体制、人才和经费是三要素。人才，过去几十年大量培养；经费，近年大量增加；体制，则亟需改革。

1949 年至今体制在不断变化。纵观中国现行科研体制，由于历史原因，某阶段内有过设计，但总体并未完整规划。中国现行的科学体制，从 1928 年的中央研究院、1929 年的北平研究院开始，那时除数学外，大学科研不够系统、不成规模。1949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将中研院南京和上海的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所和部分私立研究所重组，中国科学有了相当规模。中国科学院在成立的前十几年是任务带科学，针对某项国家需求成立相应的研究所。人才和结构由当时国家急需的应用目标所确定。到 1970 年代，周恩来总理已想过如何改变，不过那时没有机遇。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从中国科学院分出的一个机构成长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学的科学研究不断增长。1985 年，国家发布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0 年代后，国家推出了各种计划，特别是 1997 年科学院的知识创新体系和 1998 年的高校建“985 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对中国科学体制改革都有很大的触动。

3.1 延迟了 7 年的科技改革讨论重启

2005 年，有一批刊物、一批人准备好了文章，以纪念科技体制改革 20 周年，并讨论如何推动中国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因为我、鲁白、邹承鲁于 2004 年 11 月在《自然》增刊发表了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有关部委通过关系禁止全国的刊物讨论科技体制，上版的文章被撤下。而近年很不一样，国家希望推动改革科技体制。施一公和我于 2010 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的英文文章，几天之内国家领导批示六个主要部委，要求它们提出改革的应对方案。经过多方面准备，今年国家正式提出要改革科技体制。因此，延迟了 7 年的科技体制改革，有望有较大推进。

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我相信，在四个层面——国家的宏观决策、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单位的管理和科研效率等都可进一步改善。其中部分重要问题，可以通过体制改革作出较大调整。如果我们能够集思广益，理性地讨论和设计，逐渐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我相信会有成果。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相对独立于其他领域，关键在于我们多大程度愿意改革自己所在的体制。

3.2 北生所八年实践是成功范例

这里举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简称北生所）的成功例子。

在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支持下，国家为探讨科技体制改革，于2004年建立了北生所，所长是留美著名生物化学家王晓东，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大陆华人科学家。该所改革了体制，探讨了在中国可行的录用、支持、评审机制，8年实践中在论文发表、科学发现、应用、人才培养、国际同行认可上都有突出表现，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

美国资助竞争性最强的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今年宣布资助美国以外的科学家，每人获几十万美元。全球共27位获得资助，中国有7位，4位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经费投票是比口头赞誉更实在的评价，一个研究所获助超过中国生命科学半壁江山，是对北生所很大的肯定。

北生所的科研经费在2004年是1亿元，当时是突出的。2012年，国家基本还是拨同样的经费，而其他研究性质相同、相当规模的研究所（如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生物物理所）经费已是3亿到4亿，约为北生所的3倍左右，但其产出与北生所有相当距离，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北生所的体制，经费通过原体制和机制分配，即使钱很多，效率也低，这是活生生的对比。

今天，对国家来说，北生所是一个价廉物美、切实可行、实践了8年的中国本土的改革成果。国家投入多个研究所的经费已经超过北生所。2007年，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在北生所蹲点考察后准备向科研界推广，促进全国的科学体制改革。但征求其他单位意见时，遇到很多阻力和负面评价。明明很好的体制和成果，为什么会有争议？一种是害怕新体制会排斥其他体系；一种是中国式妒忌，一些人认为自己曾在中国国情中“滚过爬过”，北生所为何免灾？还有是南郭先生心态，怕新体制下显出其原形。

国家当然会继续支持北生所，但因为很多人不实事求是的反对，改革得不到推广，其他机构就无法受益于好体制。

希望科学界知情人在不同场合讨论改革，支持改革，实施改革，而不是描黑、反对和阻碍自己明知是好的体制改革。

4. 海归应该积极正面参与改革

我从1995年开始参与一些国内工作，见证或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2007年9月我回国任职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做了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对此我另有文章总结过。

多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对中国的科学有过很多的作用。今天，海归在中国科学体系里基本已占主导地位。因此，有些问题的存在其实并非国家的失误，而是我们海归的实践所致。

相比较而言，我们“文革”后大学生的海归们要向“文革”前大学生留学归来者学习，他们回国后个人待遇一度很差——据悉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从瑞典回国，四口之家在北京只有11平方米的住所。但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做人处事相当有自尊。

“文革”后的大学生回国后质量参差不齐，包括带来不少负面形象，以至我们要以行动扭转海归在中国科学界的负面形象。无论海归、非海归，都应该继承中国优秀先贤的德性——坚持原则，为人正派。我们回国要适应应该适应的，但如果与不良习俗合流，对不起国家对海归的引进。所以海归们更应该成为良性力量，助推改革。

4.1 不能因意见不一致就不作为

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可以推动改革。行政力量推动幅度固然更大，但单个海归学者在自己领导的研究组、所教的课程上也可以推动改革，也能通过支持其他人的实践而影响改革。有一种现象很普遍，但需要纠正。科技教育界95%的人都说支持改革，但对于怎么改革，很多人想法不一。还有90%的人，一听说具体某人、某项目要改革，就开始说风凉话设置一些软性阻力。结果是，人人高喊改革，但很少人改革，而且不会因为不改革而受罚。因为不改革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比如课题申请到国家项目时，费用平分，还会获得鼓掌，但没为国家发展带来益处。

我这5年的体会是，其实在任何层面，包括院系的改革都是能做的。无论是国家，还是北大的行政体系，都对改革坚定支持。而常常是基层的科研、教学人员不愿意再跨一步，有一劳永逸的倾向：在科研相关的研究型大学，教育需要改革，并非教育部不准做。我咨询了多个政策，学校批准即可实施，但院系负责人、老师不愿意尝试，或害怕造成矛盾，或怕工作加压，或怕承担责任，等等。

另外，还要敢于做没有共识的改革。我在北大做教学改革时，每个老师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应择其部分予以推动，而非意见不一致便不作为。

许多海归回来后处于制度设计者的角色，千万不要设计漏洞为自己谋利，或者自己不执行，这都是假改革，最后可能还不如不改革。

4.2 海归要坚持原则、扎实工作

我认为，海归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在国内环境中，为人要坚持原则，二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工作要扎实。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就可造就中国的良性科学环境，即使近 50 年中国科学难以全面超过世界水平，但近 30 年之内，必定会出现在应用和基础方面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某种程度而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科技教育界应该走在前头。

我相信几十年后，中国科学界的人会笑话今天我和鲁白的一些言论，说你们这也是改革？那是常识——为人自尊一点，做事扎实一点。

1883 年 Rowland 的文章还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全世界的利益，我们应该形成一套能够真正衡量人或事的价值和地位的评价体系，把头脑中所有高尚和高贵的思想放在前面，把所有对科学发展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这句话也适用于一百多年以后今天的中国科学界，可以把所说的“评价体系”改为“科学体制”。

4.3 科学对未来中国一百年很重要

对于很多家长和年轻学生，对于很多要离开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人，我想引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回应 Barbara Walters 的问话，奥巴马说，最好的工作是在科学和工程界。

不仅一百年前美国的科学家呼吁重视科学，今天的美国总统也重视科学。在中国青年纷纷要投入金融、娱乐、服务业的时代，应该清晰地阐明，科学不仅对于一百年来的美国很重要，对至少未来一百年的中国肯定也很重要。海归、非海归的科学家，特别是影响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大家应当联合起来，努力营造良好的科学环境，培养优秀的本土人才，支持他们的工作，一起做出美丽的科学。■

（文章来源：2012 年 6 月 8 日《文汇报》。）

中国如何才能不被甩出第三次工业革命？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国务院参事 汤敏

通过“打印”来生产飞机零件？不久之前，这还是科幻小说中的故事，如今已经变成现实。一种叫做“3D 打印机”的工具，能够像打印机一样将碳纤维、石墨烯、纳米等新型材料一层层地打印出来，像是堆砌一件件的产品。据说，波音公司的飞机中有很多产品都是这种技术的产物。

第三次工业革命有着两大特点：一是在新的生产方式冲击下，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会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二是新的生产工业日益个性化、定制化，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和消费市场。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来说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有人预言，“中国崛起”有可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终结。这种“唱衰”论调值得关注。在以往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而在第三次革命冲击下，追逐低劳动力的资本，将很快回流到发达国家中去。有数据显示，有近 40% 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到美国。

中国有必要抓住机会，迅速地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否则可能重蹈十八世纪末期的覆辙。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康乾盛世，没能搭上这“第一班车”，直接导致了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落后。1913 年，以规模化生产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而我们还在忙着推翻满清统治，“你方唱罢我登场”，又被这场工业革命甩下。

中国如何才能阻止历史重演，如何才能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除了要从社会、经济等各层面上进行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的宽松发展环境外，还有以下几点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抓教育。在美国，以“可汗学院”为代表的网络远程教育 2.0 正在悄然兴起，这种远程式教育可让学习者突破时空限制，自主控制学习时间和进度，而且“可汗学院”采用“游戏化”的方式教学以便让学生更好更快地接受知识。其课堂也是“颠覆式”的，一改往日“在校上课，回家做功课”的模式，学生在家看视频上课，到学校的任务反而是与老师

和同伴讨论问题、完成作业。新的工业革命渴求大批创新型人才，而我国以应试教育为主的方式难以满足需要，创建出一批全新机制的教育机构已经刻不容缓。中国也可尝试推广普新型教育方式。通过网络将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课程，提供给全国各个学校的学生以及愿意学习的社会人员。那么，我们或可突破目前教育体制的限制，改变教育不均衡现状，真正地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次是要营造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众所周知，创新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诀窍。将创新与创业完美结合才能能让国家在竞争中不被淘汰。我国目前的创新创业环境还不尽人意：对青年人的创业教育、国家政策对创业的支持、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等方面都很不“给力”；国内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以及高科技企业上市等支持创业的产业链都还在发轫期，没有形成气候。前两年，创业板的开通曾给中小企业主们带来很大的希望，但运作起来后出现了大量问题，又让投资者与创业者们倍感彷徨，对创新创业渐生畏惧之心。国家应致力于打造一个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理顺创业板市场，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创业。在这方面，政府应有所作为。

第三，政府角色要适时地转变过来。任何一次工业革命都会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一大批传统的行业被淘汰让位于新兴行业，这样才符合历史规律。但变化时期，政府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去保护现有行业，向传统企业提供补贴，竭力挽回濒临死亡的旧产业。每每有新旧交替之征兆，政府就会“本能”地帮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国有企业或者短期内能提供高额税收的传统行业。而在新兴行业的扶持上，政府却习惯于支持已经取得明显成就的行业，却忽略了其他有潜力但尚处于发展中的产业。追求增长速度、热衷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政府的这些习惯正好与小型化、个体化、多样化的新工业革命趋势相悖，如果不能及时转换角色，政府很容易“好心干坏事”，在不知不觉中阻碍经济的转型。

数字化和新型材料为代表的全新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已经悄然而来。这一潮流让类似“3D 打印机”的生产工具成为制造业的主要工具，传统的车、钳、钹、铣等生产工具的历史将会终结，制造业生产方式也将更少地依赖人力的投入。

落后挨打，这是惯例，中国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的后知后觉让国家陷入长达数年的“挨打”状态。教训在前，对于这场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不应该也承受不起再次被甩的后果。在这个关系着子孙后代的幸福，关系着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迎难而上，迎接挑战。■（文章来源：2012年6月30日《千人杂志》。）

理念改变未来

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张维迎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他们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

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这一派别对中国当前的问题视而不见：中国的情况或许是很糟糕，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它至少也比西方要好。中国模式的本质意味着官员有能力掌舵。

改革失败论者不否认中国开辟了新的道路，但认为这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问题的根源。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在中国政策精英和知识精英中几乎找不到有人公开主张减少当前的政府干预。

考虑到中国发展到现在所经过的历程，这种缺失让人奇怪。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

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北京知识界的观念错误造成的现实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政府内外没有人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似乎所有的人都顽固地忽视自由市场有可能提供的问题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导致每年发生数十万起抗议行动的野蛮拆迁事件发生。

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中国改革的头二十年，也就是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

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中国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

■(文章来源：2012 年 8 月 3 日《华尔街日报》。)

人才培养

少年强则中国强 中国需要更多青年成才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王辉耀

少年强则中国强

近来，28岁的邓露入选青年千人计划、22岁的刘路被聘为教授、22岁的焦三牛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这一系列青年人才崭露头角的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反响，赞叹、佩服有之，不解、质疑、猜测也存焉。出于对选拔机制的不信任、妒贤嫉能、保守趋旧观念等各种原因，社会和网络环境中，不乏对青年人才涌现的“惯性质疑”，一旦出现青年人才被提拔重用便笼统以有色放大镜视之。其实，从中国社会的创新发展和人才资源的合理利用的角度，青年人才崭露头角、被重用提拔的现象既是选贤用能、鼓舞青年的好事，同时也能进一步解放我们看待青年人才的思想观念。

人才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年人才更是社会民族最重要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青年时期是人生中最渴望创新也最容易创新出成果的阶段，青年人才拥有奋进的创业激情和社会理想，他们以活跃的思维、扎实的专业基础、充沛精力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成为社会创新的最大动力，为当代中国的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发展带来活力和创新精神。自古英雄出少年，纵观历史，但凡社会大发展，思想文化推陈出新的时代，都是大量青年才俊辈出的时代。三国时期诸葛亮初出茅庐年仅27岁，周瑜24岁展露才华；清末，邹容18岁写出《革命军》，梁启超19岁名扬天下；五四时期，28岁的胡适被聘为北大教授，37岁的陈独秀执掌北大文科总长之职。这些人物无一不是在青年时代，在激情和精力最旺盛的人生阶段为时代增添了创新发展的活力。一个青年人能崭露头角，青年才俊能不断涌现的时代和社会必定充满朝气和希望，富有创新和活力；反之，若青年人才得不到理解和培养，被限制甚至埋没、流失，如此保守的“老人社会”易走向思想的僵化和经济发展的停滞。

创新主力是青年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在思想解放、经济大发展的浪潮中，青年人才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增添十分重要的动力。无论是引领新经济创新的成功创业者李彦宏、马云，学术创新领域的知名学者施一公、饶毅，还是跨国公司高管张亚勤、李开复，资本运作高手汪潮涌、沈南鹏等人都是在 40 岁前便已是出类拔萃，受人瞩目的青年人才。他们或开辟了某个领域，或创新了某项事业，或引领了某个行业，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机中，这些青年才俊在各个领域已经证明了青年人才的卓越创新能力和担当精神，同时，也为全社会树立了青年人能够成才成功的典范，鼓舞更多青年人成才和创新。

既然青年人才是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创新又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全球各国都将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纳入重要的国家战略，制订各种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的政策。中国社会历经三十年成功的改革开放后，未来三十年或更长时间里，经济方面如何升级转型，文化思想领域如何取得创造性突破，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战略布局取得竞争优势，无疑需要大批高端的青年人才。所以，未来的发展不仅要在经济领域解放思想，也要在人才观念上解放思想，破除陈腐的用人理念，大胆创新人才机制、唯才是举，目光长远地储备、培养、用好青年人才。

留住、用好是关键

青年人才因其流动性高、发展空间大、适应能力强等特点，是各国争相竞争的宝贵资源，成为众多国家的全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储备和使用不仅应该着眼于时间纵向的长远，还应该着眼于全球范围。我国每年有超过 30 万青年出国留学，也有大量高端青年人才至今滞留海外，这批人才多数在国内受过基础教育，比较了解中国文化且拥有国际视野，吸引和用好这批青年人才定能为国家各方面创新发展提供动力。另外，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球许多其他国家青年人才向往的地方，在人才竞争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中，若能将高层次的“洋青年”人才为我所用，我国的国际化程度和全球竞争力也将随之提高。改革初期，有“招商引资”帮助中国经济起飞，如今“招才引智”吸引全球青年才俊，何尝不能帮助中国进一步创新转型？全球化背景下，招揽人才的国家行为和政策扶持显得举足轻重，而近期，中组部牵头出台的“青年千人计划”便是相关例证和实践。

无论是吸引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还是本土青年人才，发现、吸引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留住、培养和高效率使用这些人才。青年人才对社会升级转型和未来发展之重要不须赘述，吸引和发现他们绝非装点门面，重在发现人才后，创造利于他们发挥才能的空间、宽容其不

适应和短暂的失败，还能扶上马后送一程，积极培养他们，促使其充分发挥潜力。青年人才的特殊性决定了能否留住、用好他们的关键在于能不能给予其充分信任，让青年人才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并尽早放手委以重任、发挥才能。很多人对青年人才妒贤嫉能或心存疑虑，认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如此束手束脚始终难以实现人才任用的灵活机制，也无法人尽其才、才尽所用，还可能致使优秀青年人才外流或已经回归的人才再次外流，使得“人财两空”，于国家竞争战略无益。除了给予施展才华的空间，为了留住、用好青年人才，政府作为公共服务部门还应该在政策、服务、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尽力提供支持，帮助青年人才创业成功，使得青年人才认为这是一片能人尽其才、梦想成真的沃土。最终留住青年人才。■

（文章来源：2012年6月27日《光明日报》）

CCG 简讯

CCG 主任出席慧眼中国环球论坛

7月9日，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受邀出席了在新加坡主办的在“慧眼中国论坛”。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是唯一一个新加坡地区全方位探讨中国局势的平台。演讲嘉宾和与会者会通过五大领域：政治与社会、商业与经济、科学与科技、人文与艺术及全球关系，了解中国的新规律。今年论坛主题是：“把握新契机，应对新挑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亚洲协会副主席陈启宗、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李开复等人与会。

在论坛人才问题主题讨论中，王辉耀作为主讲嘉宾表示，在吸引人才方面，中国尚处于发展阶段，但前景广阔。就中国如何在转向服务型 and 知识型经济的过程中解决人才短缺问题，王辉耀谈到，过去几年，政府已出台了系列计划，吸引了人才回流。但也面对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是人才流入集中于沿海发达地区；二是教育体制不够开放；三是吸引更多高层次的全球性人才，更开放，少限制；四是设置世界人才机构，更好的促进人才流入并更大程度接受他们。他还认为：外国与港台大学吸收了不少优秀的大陆学生。应试教育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必须改革，才能产生创新型人才。中国教育仍在计划经济阶段，若能多引入中外合作的优质大学，或可培养一些创新型人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人才培养和交流，或可成立个世界人才组织（WTO）加以推动。

CCG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中期研讨会

2012年7月15日，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重大问题跟踪研究》中有关子课题《国际人才战略比较研究》的中期研究进展汇报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河海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赵永乐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沈荣华、武汉工程大学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

桂昭明等专家，人事科学研究院相关研究人员以及 CCG 相关课题组研究员郑金连、苗绿等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上专家针对子课题研究报告初稿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初稿资料丰富翔实填补了国内相关课题空白，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对中心下一步顺利完成该课题建言。

CCG 应邀出席“2012 年全国人事人才科研年会”

2012 年 7 月 16 日上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博士等人应邀出席在郑州召开的“2012 年全国人事人才科研年会”。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理事长、人事部原副部长戴光前，河南省副省长王铁，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吴江等出席会议。会议深入研讨人事人才重大政策顶层设计等内容。CCG 也于今年被人社部全国人事人才科研研究会吸纳为正式单位成员。

16 日下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博士应邀参加在郑州举行的“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源发展论坛”，并作为嘉宾做了关于“参与国际人才竞争，以人才驱动发展转型”的发言。王辉耀博士认为，全球化人才发展面临新的浪潮，人才流动不断加剧，目前全世界有 3% 的人不在他们的出生国工作。各国都更加重视吸引人才，同时人才的竞争也趋于低龄化，签证也更容易，移民制度已经成为国际人才竞争的主要方式。我们目前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人才资源，同时还需要面对国际人才资源。河南作为中华文化发祥地，在全球华人中有较强的品牌号召力，在人力资源基础、基础设施和交通区位优势、产业发展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人才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河南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吸引全球人才来河南发展。如开展人才特区建设，出台国际人才环流计划和国际人才鸟巢计划，抓住河南产业升级的机遇，加快同国际的接轨，以体制机制的创新推动形成人才驱动发展的新模式等。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中国人才研究会顾问王通讯、上海市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沈荣华、武汉工程大学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桂昭明以及河南省省发展研究中心、省社科院等科研机构的相关专家学者也围绕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源发展主题，分析了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源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源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CCG 应邀在广东东莞“松湖大讲堂”讲课

7月18日，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受邀在广东东莞“松湖大讲堂”讲课，为东莞积极培养和吸引人才提出建议。王辉耀认为，东莞环境优美，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是缺乏高端人才，这已经阻碍了东莞未来的发展。他认为：“现在已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招商引资向招商引智转变的时候了，吸引人才应该不拘一格。”王辉耀在谈到如何引进人才时，建议东莞、松山湖，可以采取国内国际两手抓的方式，既培养具有优秀管理、技术创新能力的本土人才，同时也吸引海外优质人才。“不论是哪国的，只要是人才，都可以引进。他认为，除了高新，东莞还应该打造良好的软环境。比如建立国际学校解决海外回国人才子女教育问题。此外，王辉耀还建议东莞可以成立一个猎头部门，积极在国际范围内寻找合适的人才。

CCG 参加人社部留学回国工作课题研讨会

2012年7月19日，CCG主任王辉耀、研究员苗绿、郑金连参加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呼和浩特召开的留学回国工作课题研讨会。研讨会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简称人社部）专技司李金生副司长主持，人社部留学人员与回国专家处张剑飞、仲笑林、傅焜、尚萌菁，人社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留学人员服务处潘磊、沙岩，以及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相关部门领导及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王辉耀主任向相关领导及专家汇报了CCG承担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问题研究”课题的进展情况，郑金连汇报了课题研究报告初稿。在场领导及专家对课题报告初稿进行了讨论，同时交流了各地在为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提供服务方面的经验及不足，并对课题研究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提出了相关要求及建议。

CCG 主任参加上海国际英才创新创业活动周

8月5日至8月10日，CCG主任王辉耀受邀参加由上海市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上海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小组主办的首届上海国际英才创新创业活动周。本届上海国际英才创新创业活动周共有5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配套、重大装备、智能电网等领域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创新人才、拥有独立知识产权和智力成果的创业人才，还有在科技前沿、业界有较高声誉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领袖、学术团体等。王辉耀主任在人才国际流动与地区创新活力主题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际人才流动新趋势与应对策略》的演讲，讲述了国际人才竞争的现状，并对上海应对国际化人才竞争提出建议。

CCG 受邀出席杭州“2012 侨界海外精英创业创新峰会”

2012年8月14日，CCG主任王辉耀受邀出席在杭州举办的“2012 侨界海外精英创业创新峰会在”。峰会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侨联副主席王永乐、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浙江省杭州市委副书记王金财出席了峰会。在前一天——8月13日晚，王辉耀主任还受邀参加杭州海外精英欢迎会上。中国侨联副主席王永乐、中国侨联经济科技部部长陈桦、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董志勇、浙江省侨联党组书记岑国荣、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张维仁等人出席了欢迎会。

CCG 参加《宏观人才学》书稿第二次会稿研讨会

2012年8月14日，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主管郑金连出席了《宏观人才学》书稿第二次会稿研讨会。

《宏观人才学》是根据李源潮同志“建设中国特色人才学理论体系非常紧迫，要加紧研究”的指示和十个方面科学人才观的理念，汇集了宏观人才学方面主要专家开展的宏观人才学理论研究，该书稿将于2012年9月底正式出版，CCG参与编写其中的第12讲“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国际人才竞争战略”。

此次研讨会由河海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赵永乐教授主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秘书长刘嵬、学术研究部主任梁晓梅、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沈荣华，武汉工程大学人才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桂昭明，以及书稿的其他编著者参与会议。会议讨论了《宏观人才学》各讲的结构及主要内容，并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和要求。■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简介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www.ccg.org.cn）简称 CCG，是由中国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所发起，由国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人才研究会、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中国国际化智库研究机构。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吸引了国际和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公共政策等专家的参与，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课题，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建设性和可行性的建议和政策研究，成为国家、社会和企业发展的高端国际智库，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提供独立的和客观性的研究。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研究重点包括：建言献策、国际问题、国际人才、可持续发展、企业国际化、华侨华商、海外留学与海归创业与发展等领域，CCG 尤其在国际人才发展和海归创新创业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如 CCG 于 2008 年参与中组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12》的可行性研究工作，负责“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专题研究；CCG 于 2011 年 5 月完成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的“完善中国绿卡制度”的课题研究报告；CCG 于 2010 年圆满完成了国务院侨办委托的“海外华人华侨专业社团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课题，并荣获国侨办优秀课题论文二等奖；由 CCG 编辑出版的《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是国内首次专门研究和出版中国出国留学和回国发展的蓝皮书。

中心还通过研究、出版、刊物和讲座等一系列的方式，研究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相应的研究和政策对策，供政府、企业和公共机构等有关部门决策采纳和参考，成为中国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高层次的智囊团和思想库。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目前已成为中国有关部门政策咨询的一个国际智库，承接了多个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课题；并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有关部委保持密切联系和畅通的建言献策渠道，为这些部门提供咨询和参考；已向中国政府有关部委提交过多份建言献策报告，影响和推动政府的相关决策，其中部分报告已经成为国家推出的政策参考和依据。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也是海内外留学人员、中外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前政要智慧和思想交流的平台，通过举办圆桌、午餐会、研讨会和中外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建立广泛的国际交流和思想影响力的网络。